

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政策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汇编 1995-1999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海 闻 卢 锋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政策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汇编(1995—1999)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海 闻 卢 锋 主编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政策/海闻, 卢锋主编.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12

ISBN 7-301-04388-0

I. 中… II. ①海… ②卢… III. ①经济-研究-中国 ②经济政策-研究-中国 IV.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9697 号

书 名：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政策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汇编(1995—1999)

著作责任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海 闻 卢 锋 主编

责任编辑：刘灵群 邱巍 朱永

标准书号：ISBN 7-301-04388-0/F·324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7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排版者：兴盛达激光照排中心

印刷者：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34.5 印张 600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62.00 元

序 言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五年来,一直致力于侧重从应用性和对策性层面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问题进行系统的经济学研究,并围绕这一目标开展了大量的学术交流活动。呈现给读者的这本简报汇编文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方面努力的成果。

从1995年5月到编辑本书的1999年9月,中心共编印发表了108份简报。简报的素材主要有两类:一是中心研究人员以及访问学者研究成果的摘要,二是有关中心大型学术研讨会和小型学术讲演内容的报道。每期简报寄赠给数以百计的政府部门、新闻媒体以及学术机构等,成为中心向社会提供有关经济政策分析研究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在庆祝中心成立五周年之际,我们将简报分类编排,结集出版,以飨读者。

阅读本书汇编的百余期简报,可以看出中心学术研究活动所体现和追求的几方面特点。第一,研究对象的实践性。例如,以发挥经济比较优势为主题的发展战略讨论,关于韩国与台湾地区发展模式比较探讨,关于我国电信政策的研究成果,关于宏观经济形势和通货膨胀、紧缩问题的分析,以及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粮食流通体制、加入WTO谈判等等的研究,所涉及的都是贴近实际经济生活的真实问题,直接切入我国改革发展的前沿。第二,分析方法的规范性。简报只能简单报告我们的分析观点和结论,但大部分简报是依托有关专题研究报告或和论文整理形成的,专题研究体现了我们倡导的比较规范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第三,研究结论的对策性。简报内容涉及内容广泛,包括发展战略、宏观经济、国企改革、产业政策、农业经济、金融体制、对外经济、国民教育、科技政策、法制建设、社会保险、区域经济等等几乎所有重大经济问题,并以独到的分析为这些问题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对策建议。第四,研究努力的持续性。中心成立之初,有些好心朋友对我们能否在国内现有条件下长期坚持学术性研究表示担忧。我们走过了第一个五年,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本文集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我们在事业追求上的决心和持续努力。

中心简报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赞誉和积极反响。很多令人尊敬的领导和前辈都曾用不同方式对简报的成功给以表扬和祝贺;很多政府决策部门官员成为简报的热心读者;简报更是各类媒体关注的资料,很多重要的简报

在多种报纸杂志发表。过去五年间,简报成为中心与社会沟通的一个重要窗口。

这本文集出版,是中心工作人员和许多同学共同努力的成果,是国内外学者以及不同部门行业师长、朋友热心扶持的成果,是北京大学领导正确指导鼓励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大力支持合作的成果,我借此机会深表谢意。在具体工作上,张帆、姚洋和办公室张佳利、邢惠清等同事以及很多同学承担了不同时期简报的整理和编辑发行任务。最后这本书的编辑出版,海闻、卢锋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1999年10月12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经济发展战略与宏观经济分析

正确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促进我国经济稳定

持续快速发展(1998年3月) (1)

寻求多重经济目标下的有效政策组合(1998年3月) (7)

——1998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建议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几个问题(1998年4月) (15)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座谈会纪要

利率至关重要(1998年4月) (20)

——中国的宏观经济周期

在增长中挤压泡沫、改善结构(1998年5月) (24)

——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次软着陆”

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如何启动经济增长?(1998年7月) (32)

中国改革的第二代策略(1998年8月) (36)

知识经济、比较优势与我国的产业发展(1998年8月) (41)

货币政策乎? 财政政策乎?(1998年11月) (46)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评析及建议

1999年中国经济发展展望和工作重点建议(1998年12月) (54)

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与经济发展(1999年5月) (61)

美中经济发展之比较(1999年6月) (65)

关于通货紧缩的定义、成因及对策的不同意见(1999年9月) (75)

第二部分 国有企业改革与产业政策

国有企业改革出路何在?(1995年7月) (79)

私有化之后: 捷克共和国的公司治理(1995年12月) (97)

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1997年6月) (103)

——林毅夫、蔡昉、李周合著新书学术研讨会

企业破产和兼并过程中的外部成本分摊问题(1998年4月)	(108)
从华远集团的发展看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矛盾(1998年6月)	(113)
企业并购应慎行(1998年6月)	(117)
开放竞争：发展我国电讯行业的政策环境(1998年10月)	(119)
——电讯大论战，兼论分步开放我国电讯市场	
自律价制度不宜实行(1998年11月)	(125)
中国各类企业就业量调整速度的比较研究(1999年5月)	(131)
非国有经济成分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1998年12月)	
.....	(134)

第三部分 外贸、外资与国际经济

中国外贸体制改革对亚太经济的影响(1996年2月)	(137)
世界贸易组织对世界贸易的影响	(142)
中国对外贸易理论与实证研究座谈会纪要	(144)
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1997年4月)	(147)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鲁杰罗的演讲	
世界经济展望与全球一体化(1997年5月)	(154)
中国会成为下一个超级经济强国吗？(1998年4月)	(158)
在全球一体化中的中国(1998年4月)	(162)
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和经验教训(1998年5月)	(166)
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面临的挑战(1998年6月)	(169)
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1998年9月)	(172)
中国是亚洲金融危机的起因吗？(1998年9月)	(176)
我国粮食贸易政策调整与粮食禁运风险评价(1998年9月)	(179)
技术进步是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吗？(1998年9月)	(183)
走出金融危机——韩国的对策(1998年10月)	(186)
俄国金融危机(1998年10月)	(190)
欧元作为国际货币在未来的作用(1998年10月)	(194)
APEC农业和食物自由化可能会有重要进展(1999年3月)	(198)
——APEC“农业和食物战略研讨会”述评	
国际论坛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辩论(1999年3月)	(204)
农业扩大开放的机遇和挑战(1999年5月)	(208)
——WTO农业承诺对我国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的影响	

从东亚发展经验看中国的经济变革(1999年3月)	(217)
外国直接投资的地点选择:中国的经验(1999年4月)	(220)
经济增长核算的误区:对亚洲经济增长的再认识(1999年5月)	(223)

第四部分 金融体制与政策

中国的贸易收支和汇率(1995年9月)	(227)
金融改革的战略选择和经济秩序的良性循环(1996年8月)	(235)
设立并逐步开放全国性的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 市场(1997年12月)	(241)
——清理整顿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后的政策选择	
金融工程——后冷战时代全球竞争的新战场(1998年2月)	(246)
对于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分析及其改进方案评价(1998年5月)	(255)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方向(1998年7月)	(261)
人民币有贬值的必要吗?(1998年7月)	(267)
货物流、资本流和经济周波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1998年8月)	(270)
国际资本流动中的流动性金融风险及政策选择(1998年8月)	(276)
香港“联系汇率”的漏洞及补救办法(1998年11月)	(280)
美国金融结构改革(1998年11月)	(284)
另辟捍卫港元的新途径(1999年4月)	(288)
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和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1999年5月)	(291)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1999年7月)	(296)

第五部分 农业与农村经济

21世纪各国水稻生产和需求预测及其政策含义(1995年5月)	(302)
——国际水稻会议综述	
改革使越南成为世界第三大稻米出口国(1995年6月)	(309)
中国农业:当前问题和政策抉择(1995年9月)	(314)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和城市隐性失业的 公开化(1997年3月)	(319)
“中国农村土地政策与农业绩效”国际研讨会纪要(1998年6月)	(325)
世界粮食最高单产水平和中国粮食生产潜力:对布朗观点 的评论(1998年6月)	(329)

中国农村改革的回顾(1998年6月)	(332)
中国的土地制度试验：已有的经验和下一步的 考虑(1998年6月)	(339)
人地矛盾多,制度需改善(1998年6月)	(343)
稳定农民预期与土地制度法律化(1998年6月)	(346)
我国肉蛋水产品产量统计存在四成左右水分(1998年7月)	(353)
我国是否应当实行农业保护政策?(1998年8月)	(356)
——外国农业保护政策的经验教训和启示	
深化市场改革是解决当前农民问题的关键(1998年8月)	(360)
中国乡镇企业的奇迹(1998年10月)	(367)
粮食是否具有“外部性”(1999年2月)	(371)
粮食问题上“泛政治化”认识误区(1999年2月)	(374)
政府开支与农村发展(1999年4月)	(377)
应当实事求是地认识粮食过剩问题(1999年4月)	(380)
——对“粮食无过剩”观点的质疑	
黄土高原土地开发的经验(1999年5月)	(384)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林业问题(1999年5月)	(387)
植物基因的产权明晰及其影响(1999年6月)	(391)
新农村运动与启动内需(1999年7月)	(395)
今年应当实施棉花收购价支持政策(1999年9月)	(400)
——棉花改革的棉农收入效应与供求过度调节问题	

第六部分 区域经济、教育、法制及其他问题

关于中国国际可比国民生产总值研究的一些问题(1996年4月)	(408)
香港经济法规的转变(1997年11月)	(416)
经济转轨与地区差距(1997年12月)	(420)
中国经济改革的社会结果(1998年3月)	(427)
——转轨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	
美国西部公共水利建设的政治经济学(1998年3月)	(432)
信息革命、交易费用、文明和经济运行(1998年5月)	(436)
中美两国教育合作前景广阔(1998年7月)	(441)
——美国商务部长威廉·戴利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珍妮特·耶伦教授北大演讲	

发展知识经济的关键与大学的使命(1998年8月)	(444)
科教兴国: 春雷? 甘雨? (1998年9月)	(448)
经济增长的源泉(1998年10月)	(453)
官僚贪污腐化与内生经济增长(1999年5月)	(456)

第七部分 大型综合性政策研讨会专题简报

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与问题(1996年2月)	(460)
——世界银行1996年度《世界发展报告》初稿讨论会综述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未来远景论坛”21世纪的中国对全球的 长期影响会议纪要(1996年3月)	(465)
祖国大陆、台湾经济学家共同探讨发展的主题(1996年8月)	(471)
——首届“两岸经济发展经验与策略研讨会”综述	
过去二十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年7月)	(485)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改革与 发展研讨会”系列报告之一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1998年7月)	(493)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改革与 发展研讨会”系列报告之二	
国有企业改革与公司治理(1998年7月)	(498)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改革与 发展研讨会”系列报告之三	
金融改革(1998年7月)	(501)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改革与 发展研讨会”系列报告之四	
社会保障与养老保险(1998年7月)	(506)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改革和 发展研讨会”系列报告之五	
中国经济热点问题	(509)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BER)第二届中国经济年会纪要(之一)	
国有企业改革专题(1999年7月)	(514)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BER)第二届中国经济年会纪要(之二)	

宏观经济政策与金融市场专题(1999年7月)	(524)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BER)第二届中国经济年会纪要(之三)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531)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BER)第二届中国经济年会纪要(之四)	

第一部分

经济发展战略与宏观经济分析

正确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 促进我国经济稳定持续快速发展

林毅夫

(1998年3月)

自去年以来的东亚金融风暴,给亚洲和其他地区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经济损失近 6000 亿美元,这些国家按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一下倒退 10 多年。

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导火线是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太高,储蓄者对银行体系和本国货币的币值丧失了信心,因而给国际金融炒家提供了狙击本国货币的机会。国际炒家先向银行借入当地货币,然后拿到外汇市场上去抛售。政府为了维系汇率的稳定,拿出国内的外汇储备去托市,但国内储蓄者见到国内货币受到狙击,信心随之崩溃,也争相抛售本国货币,改持外币以保值,外汇市场出现墙倒众人推的局面。为了维系脆弱的汇率,数百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几日之内即耗尽,等外汇储备用尽,中央银行再也无力去托市时,外汇市场出现崩盘,短短几个月,币值贬值 50%,甚至 80%。这些国家短期外债又太多,为了还债,只好接受苛刻的条件,向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借款,丧失了按国内情况制定经济政策的自主权。

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还未开放,人民币不能自由买卖,外汇储备丰富,外债也少,是少数几个不受这场金融风暴直接冲击的东亚国家。人民币币值

的稳定,使东亚国家的货币免于新一轮的竞相贬值,对于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东亚国家早日走出这场危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目前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还较低,为了更好地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加速我国经济的发展,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加入国际金融、外贸体系是必然要走的道路。但是,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还很脆弱,银行不良债务的比例偏高,为了避免金融风暴将来在我国发生,我们应该分析清楚东亚国家银行不良债务偏高的原因,及早采取防范措施,将危机消除于未发之时。

东亚国家银行不良债务偏高的第一个导因是泡沫经济的破灭。泡沫经济又可分为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

就东亚国家和地区而言,房地产泡沫上从日本、韩国,下到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几乎是无一幸免。这种现象的产生既有经济规律的内在原因,也有人为政策的外在原因。东亚国家和地区,总的情况是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相对稀缺。和人少地多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下,东亚的土地价格相对比较高。但造成房地产泡沫更关键的因素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总需求的增长,供给弹性越小的要素的价格会增长得越快,在所有生产要素中,土地的供给弹性最小,因此,价格的上涨也会最大。尤其在东亚国家,其经济活动经常集中于像日本的东京、大阪、韩国的汉城、泰国的曼谷、菲律宾的马尼拉等大城市,这更加限制了土地的供给弹性。由于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大家预期土地价格会快速上涨,为了赚取土地价格上涨的资本所得,许多人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了房地产业,因此更加速了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当大家看到房地产价格只涨不跌,就大胆以购买到的房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款来进行房地产投资。因为房地产是不动产,容易查封、保管和变卖,而且,房地产的价格只涨不跌,银行以为房地产抵押贷款万无一失,所以不少银行发放过量的房地产贷款。但不幸的是,当经济发展的速度因各种原因而放慢时,价格跌得最惨的也将是供给弹性最小的土地和房地产业,而房地产投资者看到房地产价格下跌,为了保护投资利益,竞相抛售,使房地产价格直线下落,泡沫随之破裂,原来万无一失的房地产抵押贷款也就成了不良的呆账、坏账。

东亚国家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偏高的第二个原因是股票市场泡沫经济的破灭。股票市场泡沫产生的机制和房地产泡沫相似。在短期内,股票的供给弹性有限,当经济处于上升期时,大家看到股票价格普遍上升,为了赚取价格上涨的资本所得,大量资金涌向股市,推动了股市的狂飙,股票价格远远偏离了股票分红所能支撑的水平。涌向股市的资金中有不少是以股票为抵押的银行贷款。和房地产市场一样,当经济发展减缓时,股市泡沫随即破

灭,以股票为抵押的银行贷款也就变成了不良贷款。

东南亚国家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偏高的另一类重要原因是银行将可贷资金投入效益低的行业和企业。许多以高额银行贷款建立起来的项目,建成后利润低得无法付息还本,银行贷出去的钱逐渐变成呆账、坏账。这样金融机构可贷资金开始减少,银行资金紧缩,利率提高,还不起银行贷款的企业增加,可贷资金进一步减少,利率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便迅速膨胀起来。一方面,这种膨胀一旦到了储蓄者对某一家银行失去信心,该银行就会出现挤提而崩溃。而一两家银行的崩溃经常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使许多家银行同时发生挤提,从而爆发金融危机。另一方面,如果经济中已存在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银行可贷资金减少,利率上升,投资和消费需求下降,经济增长减缓,也可能导致前面论述的泡沫经济的破裂而引发金融危机。

以银行贷款来支撑低效益行业的扩张又可分成两类情况。一类情况是国家的产业政策好高骛远,不顾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状况,盲目追求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东亚地区,即使是发展最快速的四小龙,国内资金的拥有量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处于相对稀缺的阶段,由市场决定的利率水平相对较高,不具有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重化及高新技术产业的条件。为了支持这类型产业的扩张,政府以人为方式压低银行利率,并指令银行贷款支持这类型项目。由于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资本规模一般很大,单靠国内自有资金尚不足以支撑这类型产业的大规模扩张,因此它们便大量向国外举债。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的项目到底不是资金相对稀缺的东亚国家的比较优势之所在,在政府的支持下,这类型产业可以建起来,但和发达国家相比生产成本较高,只有以亏本的方式才能把产品卖出去。导致投资于这类型项目的企业无力还本付息,国内外的银行贷款变成呆账、坏账。

在上述类型的问题中,韩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国在 70 年代以前的发展,以充分利用国内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70 年代以后开始以政府政策扶持少数几家大型企业集团发展重工、重化、汽车和微电子产业。但建起来的产业资金利润率极低,不仅难于还本付息,有时企业连维持生产所需的流动资金都成问题。为了解决燃眉之急,这些企业就以建设新项目为借口,去向银行借款,用借来的钱去维持已建项目的运转。国内银行借不到钱,就向国外银行借。开始时,外债少,信用等级高,而且,经济处于扩张期,借款容易。企业集团以债养债,规模越来越大,负债率也越来越高,30 家主要企业集团的平均负债率为 350%,有些

竟达 1200%，而资金利润率却越来越低，达不到 0.5%。当外债高到一定比例，外国银行和投资者看到韩国企业利润率低，对还本付息失去了信心，不再给予新的信贷，并开始回收资金。大型企业集团立即陷于岌岌可危的状况，开始有一两家维持不住而倒闭，这影响到投资者对大型企业集团和韩国经济的信心，进而韩国的汇市、股市、房地产市场出现恐慌，在经济扩张期形成的泡沫破裂，外汇和金融市场双双出现危机。存在于韩国大企业集团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也存在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以银行贷款来支撑国内产业扩张而效益低下的另一类情况是国际资金大量流入，融资容易，投资的产业虽大体还和国内的比较优势相符，但投资时未经细致的市场分析，已建和在建生产能力调研都很不够，生产能力扩张太快，超过国内外市场能够吸收的规模，导致建成的项目开工不足，投资效益低。80 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出现低增长，银行利率低，不少日本银行和企业将资金投向东南亚，推动了东南亚经济的繁荣。在 90 年代初期，整个国际资本看好东亚经济，大量国际私人资本流入东亚地区，1995 年日本给中国内地、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泰国等地的融资余额为 1090 亿美元，英、德、法、荷、比等欧洲国家银行的贷款余额则为 870 亿美元，1996 年日本给东亚的放款余额为 1140 亿美元，欧洲银行则增加为 1160 亿美元。这些大量涌入的资金有一部分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过渡兴旺，另有一大部分流向出口产业，90 年代初期亚洲各国出口增长很快，而从 1996 年下半年起出口增长率普遍下降。1995 年上半年，泰国出口增长 23%，1996 年上半年只增长 5.8%，1997 年以来出口增长为零；新加坡从 1996 年的 28.2% 降到 1997 年的 10.4%，马来西亚从 26.8% 降到 11.6%。外贸出口增长率下降的一个后果是，许多新增的生产能力大量闲置，投资效益低，企业信用和还债能力下降。另一个后果是外贸逆差增加，危及外汇储备的安全。

在导致金融风暴的两类原因中，泡沫经济和投资失策有内在的联系。当经济增长快时，房地产和股市容易出现过热，但只要发展的行业有竞争力，企业的效益高，自有资金的积累快，对外债的依赖程度就低，经济增长率容易维持，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可能性也会相对小。比较台湾省和韩国的发展模式和经验最能说明这点。同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省和韩国从 60 年代以来的平均年增长率差不多，在 70 年代以前，台湾省和韩国的发展同样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70 年代以后，发展模式开始分道扬镳。韩国政府大力发展资本密集的大型产业，台湾省虽随着资本和技术的积累而产业不断升级，但仍以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不如韩国的中、小型企业为主。以

汽车产业为例,韩国生产和出口的是整车,台湾省生产和出口的是零部件,以计算机产业为例,韩国生产的是芯片,台湾省生产的是鼠标、键盘、计算机主板、显示器、没有品牌或替名牌厂家组装的个人计算机、手提计算机等。但韩国生产的整车和芯片无法和欧、美、日本同类产品竞争,必须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才能出口,而台湾出口的汽车零部件和计算机产品则获利甚丰。台湾省由于发展的产业利润率高,企业资金雄厚,经济内部的资本积累快速,新投资项目的规模一般不超过岛内资本市场所能动员的资金规模,因此,外债很少。其实,台湾省经济也已有泡沫的迹象,根据美林证券台湾分公司的研究,台湾省40%的银行贷款用于房地产投资,这个比例和发生金融危机的东南亚国家不相上下。但台湾省发展的行业竞争力强,企业利润率高,经济和出口仍维持适度增长,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并未受东亚金融风暴的影响而破灭。即使台湾省将来像日本经济增长那样由80年代中期前的缩小和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高速期,转向80年代中期后技术成熟的慢速期,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但因为台湾省外债少,外汇和金融市场也可能像日本一样可以维持住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而不是像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那样,立即发生大崩溃。

从东亚的这场金融风暴中,我们可以吸取如下几点经验教训:

1. 产业的发展应以充分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为主导。在我国目前的资本和劳动力的结构条件下,根据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企业,一般规模不会过于巨大,多数依靠国内自有资金即可建立起来,不会形成过渡依赖外债来发展经济的格局。而且,这样的企业竞争力强,利润率高,一般不会出现还本付息的问题。企业利润率高也有利于资金的积累和整个国民经济资源结构的升级。随着资源结构的升级,资金逐渐由相对稀缺变为相对丰富,劳动力由相对丰富变为相对稀缺,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自然要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而升级。这样按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最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以及较快速地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2. 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房地产和股市的发展容易产生过热的现象。如果允许以房地产和股票做为抵押来炒卖房地产和股票,而政府对银行向房地产和股票的放款比例又没有合适的规定,或是有规定而没有严格的监督和执行,这种过热很容易变成泡沫。为了减低房地产在经济快速发展期的过热现象,政府应考虑经济的合理地理布局,增加土地的有效供给,避免经济活动过度集中于一两个城市。为了减低股市的过热,政府应避免采用金融抑制政策,让银行储蓄有合理的利率水平。当然,如果国民经济是按比较优势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地域会较广,而且劳动密集型产业较

依赖于银行间接融资,也付得起较高的贷款利率。这样,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就较不易形成。

3. 在我国目前这样的发展阶段,对于外国资金,应以鼓励直接投资为主。外国直接投资流动性较低,不容易受心理和预期因素变动的影响于短期间大进大出,而使国内经济突然大热,突然大冷。利用这种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还有利于外国先进技术向国内转移。同时,我国政府也可以允许一些条件成熟的中国企业到国外的资本市场去上市。但对开放我国的资本市场,允许外国资金直接炒买炒卖流动性大的国内股票、债券和允许国内企业借用短期外债等融资方式,则要格外谨慎。

4. 对我国的银行体系要早日下定决心彻底改革,真正实现在 14 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银行商业化,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目标。让银行对贷款项目的审批、资金的使用和回收以及银行的利润负起完全的责任。既要避免再以政策指令要求银行以低息贷款去支持不具比较优势的资本过度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要避免再度在人为压低银行利率的情况下,出现一放开对银行信贷的控制即出现投资过热,盲目、重复建设的情形,使生产能力在低水平的情况下形成过剩。上述两种情况都会使银行的贷款变成呆账、坏账。只有对银行进行彻底改革,完善银行监控体系,铲除产生银行不良贷款的原因,才可真正避免产生金融风暴的危险。